

全球生态治理的资本批判与样态探索

王向明 段光鹏

【摘要】 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中，人类受永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驱使而不可遏制地开发自然、驾驭自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危机之中。生态危机跨越时空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和恶化，亟需世界各国通过“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宽广视野，以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在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历史境遇中洞悉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危害、试图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框架、跨过工业文明设置的生态危机的“陷阱”、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中国方案。它致力于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重建全球生态责任观，以最终实现利益共享、激发价值认同、彰显责任担当。

【关键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生态治理；资本逻辑；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2)04-0004-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20401

一、引言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事实上，正是以占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资本逻辑在工业革命时期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它在创造

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排放污染，使资本增值与环境承载力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且逐渐跨越时空界限而演变为全球性生态危机。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社会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面临着尖锐的对立，乃至冲突，千百年来所发展的人类文明有毁于一旦之虞”^[2]。究其原因，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中，人类受永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驱使而不可遏制地开发

【收稿日期】 2021-10-26

【作者简介】 王向明(1957—)，男，云南建水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段光鹏(1994—)，男，山东新泰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19LLZD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

自然、驾驭自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危机之中。毋庸置疑，积极主动、有效化解生态环境问题而非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是保障人类历史命运与发展前途的必然选择。

然而，不同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的意见和主张分歧严重。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在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历史境遇中洞悉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危害、试图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框架、跨过工业文明设置的生态危机的“陷阱”、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将推动国际社会实现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对话协商、聚同化异、合作共赢，促使其认识到局部的修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唯有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方能确保国际环境正义和全球生态安全，在拯救自然的同时拯救人类自身。

二、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困境

所谓资本逻辑，是由资本的本质规定与自我增殖本性所决定的，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3]。受资本逻辑支配，自然不再是慑服、敬畏和崇拜的对象，而是成为资本家谋取超额利润的“有用物”，资本的丑陋本性最终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日趋凸显其反生态本性。

（一）以资本无序扩张为导向的过度生产

资本是“现代的灾难”的根源，全球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无序扩张造成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便是疯狂地攫取“人的生命力”和“自然的生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即是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而非一般的物，是一种本身不是物却又离不开物的社会关系，促使物成为一

切社会关系的统治者。资本“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6]。资本正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可阻遏地在深度和广度上开发自然，进行饮鸩止渴式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的再生产运动是没有限度的，而自然系统的再生产能力和修复能力是有限度的，生态环境有限的承载空间是无法匹配相应的资本扩张速度的。因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过度生产和大量废弃必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面临无限度的索取和加速挤压，不受节制的生产速度所引发的加速消耗与加速污染极易颠覆自然系统自我平衡的“速率”，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敌对化，造成资本生产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破坏自然系统和导致生态危机。

（二）以资本快速积累为目的的消费膨胀

资本自我增殖的欲望和快速积累的膨胀驱使资本家既要无限制地占有自然资源和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生产出大量商品，又要想尽办法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以解决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获取更多的商品利润。消费把产品消灭以后，又从观念上创造出新的需求，让资本获得了继续扩张的动力。换言之，为了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就要通过制造虚假需要，刺激人们消费。人们进行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真实需要，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是为了满足虚假需要进行的无“需”而“求”的消费。为此，资本家想方设法借助铺天盖地的广告诱骗消费者去消费那些并不被真正需要的商品，人们在虚假需要的“迷雾”刺激之下的大量消费和过度浪费会造成大量废弃，成为生态危机的窗口，破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虚假需要表面上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实际上却造成资本家更加贪婪地剥夺外在自然而加剧自然资源的物质消耗，而且向生态环境倾倒的废弃物数量不断增加。正如福斯特所说，资本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

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7]生产和消费的无限扩大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冲突会愈来愈尖锐，资源日趋枯竭不可避免，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加深，最终挤压了自然资源的代谢空间而导致生态危机。可见，资本快速积累建立在无止境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投放污染物的基础之上。然而，自然界并不具有自我调整的无限弹性，以资本快速积累为目的的消费膨胀引起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过度浪费和环境污染，既会造成对自然界本身的破坏，还会使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难以为继。

（三）以资本无限增殖为动力的技术更新

以工业革命为界，生态矛盾的表现形式、激烈程度和现实影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变革还属于幼稚阶段，二者大体上是“依附与臣服”的关系，生态问题往往表现为新耕地或居住地的开拓导致森林、草地被破坏，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8]。尽管如此，其时的人类尚未对自然界造成质的破坏，或者说对自然界的破坏是相对较小的、可以控制的，自然界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实现自我修复。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尝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甜果，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欲望得以唤起，开始宰制、征服、操控、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演变为“征服与惩罚”的关系。人类越来越不顾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修复能力，似乎成了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主宰者，却不知生态欠账不仅要社会来支付，还需后代去偿还。随着资本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空间被嵌入资本逻辑的运作规划中，资本社会从原初的偏隅之地开始向各处扩展。划时代的技术变革所催生出的“历史加速度”，使资本逻辑成为资本家永不餍足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全

球价值选择。以资本无限增殖为动力的技术更新，使自然成为服从人的需要的奴仆而不再是一种自为的力量，成为人类为满足自身占有欲和贪婪欲而用以换取利润的商品。当人类为自然成为自身征服、支配和占有的对象而欢呼雀跃之时，生态危机的乌云已逐渐笼罩于人类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三、全球生态治理的宽广视野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狭隘走向相互交往、由封闭走向逐步开放的世界历史已然成为一个经验事实。尽管维柯、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考察人类整体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趋势，然而却囿于旧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而未能实现对世界历史的科学把握。马克思则认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必然是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世界史，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人类才开创了打破民族、国家或地区限制的经济生产方式，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普遍交往而跨越时空障碍，开始了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唇齿相依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科学地描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为清除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层层精神枷锁、思想沉珂提供了宽广视野。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根本动力是以分工细化为基础的社会性的大工业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9]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有限导致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较低，原始封闭、各自为政是人类那时所处的空间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更新和交通工具的改进，从起初的偶然性分工到后来的社会性分工，再到现在的世界性分工，作为生产扩大化结果的分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活动的空间由陆地向海洋乃至全球扩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

产阶级用残酷的殖民扩张渐渐打破主权国家之间自然形成的传统封闭格局，逐渐使原材料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海外市场成为新的资本市场，将原本处于分散状态的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集中起来，使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迅速扩大。随着资本逻辑摧毁所有阻碍世界历史形成的限制，以往相互独立的民族历史逐渐走向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此，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10]。

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不断深入的历史过程。“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然而，自然界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人类的产生源于自然界的演进，自然界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弃的生命家园，人类只有实现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索取才能生存。劳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与外部自然建立关系的实践活动。劳动使人从动物界中超脱出来，开始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更全面地依赖于自然界而不是脱离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自然界的基础之上，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历史延续的物质基础。没有人类，自然界依旧可以存在；离开自然界，人类却不能生存。人类既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又不能停止对自然界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开发和改造，不断地使自然界发生符合自身需要的改变，使自然界被牢牢打上人类意志活动的烙印，成为人类生存生活资料的源泉，成为人类工作的场所和家园。但随着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和普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来。这一矛盾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包含的矛盾，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和索取，当超过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时所产生的矛盾，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钥匙蕴藏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之中。

(二) 资本对生态的时空压缩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不是没有温度的玄奥缥缈的绝对活动，而是彼此之间结成某种关系相互协作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中共同演进，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促使交往扩大，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普遍性交往，从而加速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与此相伴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显现出世界历史性特征，人类对自然界开始进行为所欲为的征服和奴役以最大限度地填满贪婪的欲壑。欧洲殖民者从旧大陆携带来的动物、植物和病菌更是加速了世界历史的生成，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无情打破，从而造成自然系统在时空双重维度上的压缩。生态危机跨越时空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和恶化，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方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推动了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增值驱动为动力、以生产交换价值为手段、以市场交换为中介的经济组织形式，要求用最快速度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和扩大资本积累的生产目的，因此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且不断扩大市场，发展趋势是跨过国界把整个世界作为活动空间和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业的深度嵌入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滋生了奢侈浮华的消费理念和物质至上的生活方式，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耗竭过程和生态危机的恶化程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潜能的巨大释放与发展空间的迅速扩大，关切海外经济利益的资产阶级必然开辟出世界性的消费市场，让那些廉价的商品、逐利的资本、先进的技术等流动的生产要素成为摧毁一切民族交往壁垒的重炮。物质消费至上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不再是消费的主体而成

为消费的工具，陷入不可自拔的迷惘与怪圈之中，不断以虚假需要加剧全球生态危机。

总之，资本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因此，要反思资本逻辑在索取利益时造成的生态危机，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在行动中形成自我约束与自我限制的准则。通过树立整体性思维，对生态环境进行协同治理，推动人类克服资本逻辑的钳制，努力去探索和促使自然系统的平衡，从生态互生与共生的角度追求自然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双重统一，解决人类文明发展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使人类在生态理性之路上昂首向前，使自然充满感性的光辉，成为诗意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始终保持和谐统一。

（三）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输出

人类的不合理活动引发生态结构损坏、自组功能失灵以及生命系统肢解，导致的一系列生态环境恶果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亟需世界各国以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然而，面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竞争进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各国不是荣辱与共、彼此合作，而是相互推诿、相互斗争。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始终啃食、攫取最大方面的利益而保持赢家地位，落后国家在资源与利益方面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不同程度上的剥削和压榨，甚至产生更为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处在全球工业价值链和生态链的上游，在全球生态危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将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推向处于下游的发展中国家，肆意掠夺他国自然资源且任意倾倒废弃物，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生态不平等和生态不正义。面对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和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西方发达国家拒绝履行全球生态保护的义务，积极寻找各种路径和方法转嫁生态危机，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无休止的资源掠夺以尝试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又试图以牺牲他国人民与代际生态利益来满足增殖欲而将能源消耗产生的环境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导致生态危机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和蔓延。生态危机和生态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质的佐证，人与自然冲突的背后是资本肆无忌惮的膨胀。资本逻辑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湮没在永无止境的利益欲望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真正对生态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反而会继续对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宽广视野来看，生态治理问题已然演变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下去。以往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唱“独角戏”的治理方式已很难应对日益复杂的生态治理问题，而且仅凭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也不可能承担起生态治理重任，唯有以保护自身命运的诉求、以实现永续发展的使命和责任来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才能加以应对。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2] 各国要正确认识到，工业文明既把人类从自然界中极大地解放出来，使社会意义上的人类和世界历史成为现实；同时苟延残喘至今的世界秩序又带有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主义胎记且越来越不合时宜，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僵局。唯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工业文明的狼藉中实现人身外的自然与人本身的自然的和解，才不至于自我毁灭。因此，各国亟需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矫治不公正、不道德的发展样态，擦除二元对立、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底色，以全新的理念引领全球生态治理，防止生态危机的持续扩散和恶化。

四、全球生态治理的样态探索

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3]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忧思自身生存危

机而主动重新发现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结果，通过跨越时空、国界、性别和种族差异，致力于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重建全球生态责任观，实现最大程度的共建、共担、共享，蕴含着一种让大自然真正回归到“自然本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明新愿景，对于走出过去那种不断掠夺自然进而遭到自然界报复的窘境，维持和保障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系统处于稳定、和谐、可持续状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实现利益共享

对自身利益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实现利益共享，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纽带和桥梁。如今，区域生态利益与全球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无情地拷问着世界各国。利益是人类处理生态问题、应对生态危机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取舍。乌尔里希·杜赫罗认为：“人类和经济发展指标不应该再完全或者主要反映物质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必须考虑到个人、社会和环境的福利。”^[15]因此，全球生态治理要遵循生态平等和生态正义的价值取向，合理协调各民族、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扩大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交汇点，拓展共同利益并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换言之，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将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机融合在一起，把全球生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有机融合在一起，树立限度生存与永续发展相协调的理念，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方面达成利益共识，以调节国与国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形成覆盖全球、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生态利益共同体以维护人类世代代生存传承繁衍的共同目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是一个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整体，强调实现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是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正确途径，唯有以对话协商的方式选择或重建一种普适的利害权衡规则系统和方法体系，通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交汇点为实现利益共享创造机会，才能使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使全球生态问题得以解决，最终勾勒出可触摸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命运相系的美好图景。

（二）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激发价值认同

价值观念的分歧往往是导致行动不一致乃至爆发激烈矛盾与冲突的内在原因，全球生态危机正是人类缺少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而产生的。超越以往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不再将自然视为可任意蹂躏、僵死无生命之物，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思维前提。“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16]如果只将人类看成价值主体而将自然认定为价值客体，缺乏对自然的尊重而只是工具性地利用自然，自然最终将走向人类的对立面。因此，要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价值观，不再把自然作为纯粹“无言的存在”。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够在利己的同时利他，因此可尝试探索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把“类意识”“类观念”“类生存”作为价值的基底，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展现出自然的整体性、人类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相统一的整体思维，意识到无法切割的生态环境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存前提，要打破阻碍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交往的观念隔阂，正确认识二者之间血肉相通、生命相连的一体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争取更多主权国家的价值认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避免重走“新旧世界霸主”全球争霸的老路，要打破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非正义秩序，抛弃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追逐金山银山的粗放型发展道路，科学识别、规避、消弭生态风

险,对人类实践过程中不合理行为产生的环境恶果进行修复补偿,促进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使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总之,要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思想上改变那种“向自然宣战”“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改变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和先发展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观念,要树立“人是自然的朋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树立损害自然就是损害自身、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的理念,使人类肩负起关怀、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在对自然的承认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三) 重建全球生态责任观,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彰显责任担当

当今世界各国已成为一个利益高度交融、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利益共赢共享是基本原则,合作共商共建是具体行动。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责任分担问题却存在分歧。发达国家为了获取更多自然资源以及缓解本国生态危机,利用全球化浪潮把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却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耗费,想方设法让发展中国家为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承担更多责任,从而以责任最小化争得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因本国自然资源被掠夺和生态环境被破坏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又因自身能力相对有限而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可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是口号或者宣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经济利益面前依然难以达成共识。习近平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17]实际上,人类既是环境灾难的终极肇事

者,又是环境疾病的终极治理人,应该共同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旗帜鲜明地反对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推诿。一方面要强调世界各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共同责任,使人类认识到唯有通力合作、同舟共济,共同担负起生态治理的责任才能维系人类生存;另一方面要强调世界各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差异责任,使人类认识到发达国家是全球生态问题的主要肇始者和担责者,并且因其经济发达、技术领先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和良好条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既要承受主要由发达国家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恶果,又面临着缓解本国贫困问题带来的压力与技术硬件上的劣势,因此要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生态治理的原则遵循,尽可能地让一国的生态责任与该国的综合实力相匹配。也即,发达国家在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的同时,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型技术和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亦要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切实防范、抵御、消解生态危机。正如科尔曼指出:“全球责任将使人们理解到,我们关注自己所在地区的大气和水的污染,也同样关注由我们造成的其他地区的污染。”^[18]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9]。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原则和措施,包括引导制定和实施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生态危机解决方案,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积极探索全球生态治理模式,尽最大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向而行,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为全球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案的谋划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529.

[2] 陈墀成.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M]. 中

- 华书局, 2005: 28.
- [3] 丰子义. 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24-30.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871.
- [5] 同[4], 第 877 页。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287.
- [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 耿建新、宋兴无译.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3.
- [8] 同[6], 第 560 页。
- [9] 同[1], 第 520 页。
- [10]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5.
- [11] 同[1], 第 519 页。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 外文出版社, 2020: 46.
- [13]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4-23.
- [14] 同[1], 第 286 页。
- [15] (德)乌尔里希·杜赫罗著, 宋林峰译. 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06.
- [16]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曹荣湘译. 气候变化的政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外文出版社, 2017: 529.
- [18] (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 梅俊杰译. 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83.
- [19] 同[17], 第 525 页。

Capital Criticism and Mode Explora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WANG Xiang-ming DUAN Guang-peng

Abstract: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center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human beings are driven by the endless pursuit of value-added capital to unstoppably develop and control nature, put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crisis.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spreading and worsening globally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It is urgent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handle and resolve it in a fair, just,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manner through the broad vision of “the transition from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precisely the Chinese plan to understand the dangers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global spread of ecological crisis, to try to transcend the ruling framework of capital logic, to cross the “trap” of ecological crisis set b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is committed to r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 ecological interests, reshaping global ecological values, and rebuild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benefits, stimulate value recognition, and demonstrate responsibility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pital logic; world history